

# 企业家精神、经济增长目标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王文举<sup>1</sup>, 姚益家<sup>2</sup>

(1. 北京物资学院 经济学院, 北京 101149; 2.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经济学院, 北京 100070)

**摘要:** 使用全要素生产率测度经济高质量发展, 基于 2001—2017 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 在引入地方政府制定经济增长目标的背景下, 使用系统 GMM 方法实证研究企业家精神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效果。研究发现: 企业家精神显著地促进了经济高质量发展。在进一步引入了政府经济增长目标的调节作用后发现, 当地方政府制定越高的经济增长目标时, 企业家精神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越弱, 即地方政府制定过高的经济增长目标会抑制企业家精神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研究结论为新时代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更好地发挥企业家精神对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作用提供了政策依据。

**关键词:** 企业家精神; 经济高质量发展; 经济增长目标; 系统 GMM; 全要素生产率

**基金项目:** 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9ZDA12)

**作者简介:** 王文举(1965—), 男, 吉林辽源人, 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博弈论与经济计量分析研究; 姚益家(1991—), 男, 黑龙江哈尔滨人, 博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博弈论与经济计量分析研究。姚益家为本文通讯作者。

**中图分类号:** F2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1096(2021)03-0086-09

**收稿日期:** 2020-07-05

DOI:10.15931/j.cnki.1006-1096.20210408.003

## 引言

随着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 中国经济已经进入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 过去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驱动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越来越难以为继, 急需寻找经济增长新动能, 实现质量变革、效率提升、动力转换,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 “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 鼓励更多社会主体投身创新创业。”2017 年 9 月 8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中也指出, “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 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 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企业家精神就是内置于每一个个体决策者内部的企业家才能, 具有强烈的冒险精神, 在市场激烈的竞争中进行创新和创业活动(程锐, 2019)。在当前中国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 无论是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还是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都需要依赖一大批具有创新精神和创业精神的企业家。新时代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企业家精神。因此, 本文重点关注企业家精神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果。具体而言, 本文选取研究中通常使用的全要素生产率来测度经济高质量发展, 实证考察企业家精神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 以期揭示企业家精神在推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发挥的作用和效果。

此外, 过高的经济增长目标被认为不利于经济高质量发展, 徐现祥等(2018)使用中国省级经济增长目标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 经济增长目标与经济发展质量负相关, 经济增长目标每提高 1 个百分点, 经济发展质量就会下降约 1 个百分点。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 中国地方政府都倾向于制定过高的经济增长目标, 经济增长目标“层层加码”的现象广泛存在(周黎安等, 2015; 余泳泽等, 2019)。例如 2017 年, 制定经济增长目标高于全国目标的省份就有 26 个, 占全国的 84%, 2016 年制定经济增长目标高于全国目标的省份也有 25 个, 占全国的 81%。当地方政府制定了过高的经济增长目标时, 地方政府和企业为了达到目标会采取粗放型的生产方式, 显然抑制了经济高质量发展。那么, 地方政府制定过高的经济增长目标是否会影响企业家精神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效果, 这是本文将要探讨的问题。

相较于已有研究, 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有: (1) 本文使用全要素生产率来测度经济高质量发展, 选取

2001—2017 年中国省域面板数据,使用系统 GMM 方法实证研究了企业家精神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效果,丰富了企业家精神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研究成果,为新时代发挥企业家精神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积极效能提供决策参考。(2) 本文引入了地方政府制定经济增长目标的背景,将企业家精神、政府经济增长目标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纳入同一研究框架,实证考察了政府经济增长目标对企业家精神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作用效果的可能影响。

本文其余部分安排如下:第一部分在总结相关研究和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本文研究假说;第二部分介绍回归模型设定、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第三部分是实证分析,检验了企业家精神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效果,并考察了政府经济增长目标对企业家精神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作用效果的可能影响;第四部分概括了本文的研究结论与建议。

## 一、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说

### (一) 文献回顾

企业家精神从提出伊始就受到主流经济学界的广泛关注。近年来,国内外研究主要关注于考察企业家精神对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作用效果,主要可以分为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两个层面。理论研究层面,Schumpeter(1912)系统阐述了企业家精神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认为企业家通过创新活动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持续的活力。Baumol(1968)将企业家精神引入到微观经济理论分析框架,论证了企业家精神在经济增长和经济繁荣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庄子银(2003)则通过建立南北贸易框架下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说明了从事模仿活动的南方企业家是影响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建议建立提升企业家数量和扩大企业家活动范围的政策和制度环境。Acs 等(2012)构建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研究发现企业家精神通过知识溢出效应和商业化途径促进了经济增长。实证研究层面,Beugelsdijk 等(2004)使用自我雇佣率作为企业家精神的代理变量,对欧洲 54 个地区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发现,企业家精神可以显著促进地区经济增长。Panagiotis 等(2015)基于希腊数据的实证研究显示,创业和创新都对希腊经济增长产生了正向影响。Salgado-Banda(2007)通过对 22 个经合组织成员国 1980—1995 年面板数据的实证考察却发现,创新与地区经济增长正相关,而创业活动与地区经济增长负相关。Stephens 等(2013)则通过考察阿巴拉契亚山脉周边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数据发现,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和创业精神是促进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中国也有多数研究从实证角度来考察企业家精神对中国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影响,李宏彬等(2009)将企业家精神分解为创新精神和创业精神,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发现,企业家创新精神和创业精神都对中国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程锐(2016)实证研究发现,企业家精神对缩小中国地区经济发展差距具有积极作用。李政等(2020)通过采用 2000—2016 年中国 285 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发现,企业家精神显著提升了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并且发现该提升作用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郑炫圻(2020)则基于中国省际数据考察了企业家创新精神对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影响,认为企业家创新精神能够显著促进中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马忠新等(2019)也基于对中华老字号企业空间分布的考察,实证研究了企业家精神历史传承对经济绩效的影响机制。

综上,国内外已有研究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对企业家精神与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但是较少关注企业家精神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效果,并且鲜有研究考虑到在地方政府制定经济增长目标的背景下,对这种作用效果进行考察。为此,本文使用全要素生产率来测度经济高质量发展,并且引入了政府经济增长目标的调节作用,选取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企业家精神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效果,其结论对于新常态下培育经济新增长点和新动能、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启示。

### (二)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持续多年的高速增长,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创造了“中国奇迹”。在此过程中,企业家精神发挥了重要作用,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驱动力(张玉利等,2018)。当前,中国经济正转向高质量发展,经济增长动力逐步由要素驱动转变为创新驱动,更加需要充分激发企业家精神。新时代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第

一,企业家精神可以促进技术创新。Schumpeter(1912)指出,企业家通过“创造性破坏”活动来实现技术创新,进而促进经济的长期增长。Baumol(1968)更是将这种企业家精神视为驱动经济增长不可或缺的特殊生产要素。曾铨等(2017)的实证研究表明,在中国企业家精神也能显著地促进技术创新,驱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技术创新有利于缓解中国经济发展的资源和环境约束,提高中国经济发展的集约化水平,进而推进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新时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泉(陈昌兵,2018)。发挥企业家精神,释放企业家才能,有利于实现中国创新驱动发展的战略目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第二,企业家精神可以优化资源要素配置。企业家的创新和创业活动作为资源要素配置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可以增加企业数量,扩大竞争范围,加强要素的自由流动,促进资源要素的市场化配置(贺晓宇等,2018;程锐等,2019)。创新和创业活动还可以增加产品数量和产品种类(Dixit et al,1977),激发市场活力,改善供给结构,提升供给质量,有利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些都是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第三,企业家精神可以产生知识溢出效应。Braunerhjelm等(2010)认为,基础知识无直接生产力,只有转化为应用知识才能促进生产,但是基础知识与应用知识之间存在知识过滤器,阻碍了基础知识向应用知识的转化,而企业家通过创建新企业、应用新技术、识别机会、承担风险以及商业化等活动克服了知识过滤器的阻碍作用,实现了基础知识向应用知识的转化,产生了知识溢出效应。企业家精神通过这种知识溢出效应,促进了经济增长(Acs et al,2012)。充分利用企业家精神的知识溢出效应,也有助于改善中国科研成果转化率低的现状,促进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这也符合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据此,本文提出假说1。

假说1:企业家精神会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一直以来,中国政府都肩负着制定经济增长目标和促进经济平稳增长的责任。制定合理的经济增长目标有利于形成良好的社会预期,促进经济平稳增长,实现充分就业。合理的经济增长目标也有利于促进企业家进行创新创业活动,激发企业家精神,进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而制定过高的经济增长目标会迫使地方政府和企业为了达到目标而采取粗放型的生产方式,不利于发挥企业家精神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一方面,地方政府为了达到目标通常会偏向于将财政支出投向于基础设施建设等短期内对经济增长具有较大拉动作用的生产领域,而减少向短期内对经济增长难以产生推动作用的技术创新活动进行财政支出,使得生产性建设支出挤出了技术创新活动相关的财政支出,导致地方政府对技术创新活动的财政支出力度严重不足(Borge et al,2014;吴延兵,2017),不能为企业家创新创业活动提供足够的支撑,降低了技术创新的规模和效率(Zhang et al,1998;李政等,2018)。另一方面,在完成政府经济增长目标的硬约束下,企业也会被迫采取“重生产轻创新”的粗放型生产方式,减少对技术创新活动的支持力度,同样不利于企业家创新创业活动的开展,对企业家精神产生“挤出效应”。这些都束缚了企业家精神在创新驱动发展和资源要素配置过程中发挥作用,抑制了企业家精神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据此,本文提出假说2。

假说2:地方政府制定过高的经济增长目标会抑制企业家精神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

## 二、研究设计

### (一) 模型设定

首先,为验证假说1,即考察企业家精神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设计如式(1)所示的回归模型:

$$Quality_{i,t} = \beta_0 + \beta_1 Entre_{i,t} + \beta_j Control_{i,t} + \varepsilon_{i,t} \quad (1)$$

式(1)中, $Quality_{i,t}$ 表示*i*地区*t*时期的经济高质量发展; $Entre_{i,t}$ 表示*i*地区*t*时期的企业家精神,其回归系数反映出企业家精神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Control_{i,t}$ 表示相关的控制变量; $\varepsilon_{i,t}$ 表示随机误差项。为了消除内生性问题,本文参考李宏彬等(2009)以及孙英杰等(2019)的研究,采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并使用系统GMM方法进行估计,式(1)进一步表述为:

$$Quality_{i,t} = \beta_0 + \beta_1 Quality_{i,t-1} + \beta_2 Entre_{i,t} + \beta_j Control_{i,t} + \varepsilon_{i,t} \quad (2)$$

其次,为验证假说2,即考察政府经济增长目标对企业家精神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作用效果的影响,在式(2)中加入政府经济增长目标作为控制变量,并同时加入政府经济增长目标和企业家精神的交乘项,设计如式(3)所示的回归模型:

$$Quality_{i,t} = \beta_0 + \beta_1 Quality_{i,t-1} + \beta_2 Entre_{i,t} + \beta_3 Entre \times Target_{i,t} + \beta_4 Target_{i,t} + \beta_j Control_{i,t} + \varepsilon_{i,t} \quad (3)$$

式(3)中,  $Target_{i,t}$  表示  $i$  地区  $t$  时期的政府经济增长目标, 其回归系数反映出政府经济增长目标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Entre \times Target_{i,t}$  表示  $i$  地区  $t$  时期的政府经济增长目标和企业家精神的交乘项, 其回归系数反映出政府经济增长目标对企业家精神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作用效果的影响。

## (二) 变量选取

被解释变量。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本文的被解释变量,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极为丰富, 具有多维性(金碚, 2018), 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的深度融合。由于其内涵的丰富性和多维性,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测度在国内尚未达成完全一致的认识。已有研究通常使用能反映经济效率的指标来表示, 如人均实际 GDP、全要素生产率、劳动生产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福利碳排放强度等。全要素生产率是在资本、劳动等生产要素投入既定的条件下所达到的额外生产效率, 是一切由创意和创新带来的效率提升(蔡昉, 2013)。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推动中国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因此, 本文认为相较于其他指标, 全要素生产率可以更为全面和客观地衡量经济效率, 故参考刘思明等(2019)以及马茹等(2019)的研究, 使用全要素生产率来测度经济高质量发展。本文使用学术界常用的索洛余值法来测算全要素生产率, 考虑到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的异质性, 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可以表示为:

$$Y_{i,t} = A_{i,t} K_{i,t}^{\gamma} L_{i,t}^{\psi} \quad (4)$$

式(4)中,  $Y$  表示总产出,  $K$  表示资本投入,  $L$  表示劳动投入,  $\gamma$  和  $\psi$  分别表示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的产出弹性,  $A$  表示全要素生产率。各地区在不同时期的全要素生产率可以表示为  $A_{i,t} = \frac{Y_{i,t}}{K_{i,t}^{\gamma} L_{i,t}^{\psi}}$ 。本文在全要素生产率测算过程中涉及的指标度量和参数取值说明如下: 总产出  $Y$  使用 2001 年不变价计的地区实际生产总值来衡量。劳动投入  $L$  使用地区的就业人数来衡量。资本投入  $K$  使用学术界常用的永续盘存法估算出的地区资本存量来衡量, 具体公式为:  $K_t = I_t + (1-\delta) K_{t-1}$ 。式中,  $I_t$  是第  $t$  年的投资额, 使用 2001 年不变价计的地区实际固定资产形成总额来衡量;  $\delta$  表示固定资产的折旧率, 参考聂长飞等(2020)的研究取值为 9.6%。本文将基期设定为 2001 年, 期初资本存量  $K_0$  使用公式  $K_0 = \frac{I_0}{g+\delta}$  来进行估算, 式中  $g$  表示实际固定资产形成总额的年平均增长率。

对式(4)两边同时取对数并进行估计, 估计得到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的产出弹性  $\gamma$  和  $\psi$ , 将  $\gamma$  和  $\psi$  的估计值代入  $A_{i,t} = \frac{Y_{i,t}}{K_{i,t}^{\gamma} L_{i,t}^{\psi}}$  得到各地区在不同时期的全要素生产率。

核心解释变量。(1) 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具有丰富的内涵, 包括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创业精神、竞争精神、冒险精神以及捕捉机会的敏锐度等, 其测度在学术界尚未达成共识。已有研究大多使用能表征企业家创新创业活动水平的指标来表示, 如 R&D 经费投入、专利数量、自我雇佣率、企业所有权率等。本文参考 Hebert 等(1989)的研究, 将企业家精神划分为企业家创新精神(*Inno*)和企业家创业精神(*Ent*)来进行测度。其中, 企业家创新精神反映企业家的创新活动水平, 本文参考李小平等(2017)以及程锐(2019)的研究, 使用 15 岁~64 岁人口中每百万人专利申请授权数来衡量。企业家创业精神反映企业家的创业活动水平, 本文参考李宏彬等(2009)以及程锐(2016)的研究, 使用各地区私人企业和个体企业从业人员数与全部从业人员数的比值来衡量。(2) 政府经济增长目标。本文参考徐现祥等(2018)以及余泳泽等(2019)的研究, 使用每年年初各省政府工作报告中公布的当年 GDP 增长速度目标来衡量。

其他解释变量。(1) 人力资本水平(*Hum*), 使用人均受教育年限来衡量, 具体的计算公式为: 人均受教育年限 = (小学人口数×6+初中人口数×9+高中人口数×12+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口数×16)/总人口数。(2) 政府干预程度(*Gov*), 使用地方政府财政支出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来衡量。(3) 对外开放程度(*Open*), 使用地区进出口总额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来衡量。(4) 基础设施水平(*Infra*), 使用地区拥有公路的里程数与地区总人口数的比值来衡量。(5) 城市化水平(*Urb*), 使用地区城镇人口数与地区总人口数的比值来衡量。(6) 金融发展效率(*Fin*), 使用地区贷款余额与地区存款余额的比值来衡量。(7) 产业发展水平

(Ind),使用地区第三产业生产总值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来衡量。

(三) 数据来源与统计特征

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选取中国除西藏、台湾、香港和澳门以外的 30 个省(区、市) 2001—2017 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金融年鉴》以及各省份历年统计年鉴。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 1 所示。

表 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 变量符号    | 变量名称     | 均值      | 标准差     | 最小值    | 最大值      |
|---------|----------|---------|---------|--------|----------|
| Quality | 经济高质量发展  | 1.2943  | 0.1236  | 0.9704 | 1.4365   |
| Inno    | 企业家创新精神  | 6.1812  | 8.7853  | 0.1835 | 63.5257  |
| Ent     | 企业家创业精神  | 0.1824  | 0.1325  | 0.0347 | 0.7986   |
| Target  | 政府经济增长目标 | 0.0971  | 0.0156  | 0.0550 | 0.1500   |
| Hum     | 人力资本水平   | 8.3489  | 1.0714  | 4.7638 | 11.0938  |
| Gov     | 政府干预程度   | 0.1755  | 0.0794  | 0.0472 | 0.5911   |
| Open    | 对外开放程度   | 0.3371  | 0.3935  | 0.0362 | 1.8046   |
| Infra   | 基础设施水平   | 26.6676 | 18.7363 | 2.8750 | 125.8259 |
| Urb     | 城市化水平    | 0.3753  | 0.1748  | 0.1463 | 0.9542   |
| Fin     | 金融发展效率   | 0.8267  | 0.1759  | 0.4219 | 1.6463   |
| Ind     | 产业发展水平   | 0.4525  | 0.1217  | 0.3125 | 0.8479   |

三、实证分析

(一) 基准回归

企业家精神和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关系,进而导致模型存在内生性问题。其原因是一个地区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越高,通常代表着该地区具有更加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更加自由的要素流动以及更加健全的法制体系,会极大地降低企业家在创新创业过程中所面临的系统性风险,促进企业家进行创新创业活动,从而使得该地区的企业家精神水平越高。为了解决模型的内生性问题,需要寻找合适的企业家精神工具变量。然而,寻找合适的企业家精神外生工具变量存在着极大的理论和实践困难(程锐,2019)。因此,本文使用 Blundell 等(1998)提出的系统 GMM 估计方法来对模型进行估计,该方法利用被解释变量和内生性变量的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以解决模型的内生性问题。具体而言,本文选取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企业家精神的滞后一阶项作为工具变量来进行估计。根据基准回归的回归结果,Arellano-Bond AR(2) 检验和 Sargan 检验的结果均不显著,表明模型估计过程中不存在高阶序列相关性和过度识别问题。

首先,为了考察企业家精神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对式(2)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 2 第(1)列和第(2)列所示。第(1)列考察了企业家创新精神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回归结果显示,企业家创新精神的回归系数在 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企业家创新精神可以显著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第(2)列考察了企业家创业精神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回归结果显示,企业家创业精神的回归系数在 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企业家创业精神也可以显著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由此,本文认为企业家精神可以显著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验证了假说 1。究其原因,是由于企业家精神可以显著促进技术创新,优化资源要素配置,并且产生知识溢出效应,进而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促进了经济高质量发展。因此,应当建立能够充分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的体制机制,为新时代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动力源泉。

从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看,人力资本水平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加快人力资本积累、提升人力资本质量可以有效地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政府干预程度的回归系数均不显著,可能是由于地方政府在财政支出过程中只重数量而轻质量,导致政府生产性建设支出挤出了技术创新活动相关的财政支出,最终使得政府财政支出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效果并不显著。对外开放程度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也均不显著,说明现阶段进出口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推进力度不足,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开放红利”仍需进一步挖掘。基础设施水平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完善的基础设施水平能够加速知识和信息的传播,是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城市化水平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城市化发展有利于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这一结果也符合预期。金融发展效率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均显著为正,说明建设完善的金融体系、提升金融发展的效率和水平有助于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产业发展水平的回归系数均不显著,说明现阶段

产业发展水平未能有效地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因此,各地区在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应当注重产业内部的发展质量,而非一味地追求产业扩张的规模和速度。

为了考察政府经济增长目标对企业家精神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作用效果的影响,对式(3)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2第(3)列和第(4)列所示。第(3)列考察了政府经济增长目标对企业家创新精神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作用效果的影响。回归结果显示,政府经济增长目标的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负,表明过高的政府经济增长目标不利于经济高质量发展。政府经济增长目标和企业家创新精神的交乘项的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负,表明政府经济增长目标对经济高质量发展与企业家创新精神的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政府经济增长目标制定得越高,企业家创新精神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越弱,即过高的政府经济增长目标抑制了企业家创新精神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第(4)列考察了政府经济增长目标对企业家创业精神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作用效果的影响。回归结果显示,政府经济增长目标的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负,表明过高的政府经济增长目标抑制了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第(3)列的回归结果一致。政府经济增长目标和企业家创业精神的交乘项的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负,表明政府经济增长目标对经济高质量发展与企业家创业精神的关系也具有负向调节作用,在政府经济增长目标制定得越高的地区,企业家创业精神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越弱,即过高的政府经济增长目标也抑制了企业家创业精神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据此,本文认为过高的政府经济增长目标会抑制企业家精神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验证了假说2。当地方政府制定了过高的经济增长目标时,地方政府和企业在完成目标的硬约束下会被迫采取粗放型的生产方式,减小对创新创业活动的支持力度,不利于企业家创新创业活动的开展,进而抑制了企业家精神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因此,地方政府在制定经济增长目标时,应当充分考虑本地区实际情况,避免因制定过高的经济增长目标而抑制企业家精神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

表2 基准回归结果

| 变量                 | (1)                   | (2)                   | (3)                    | (4)                    |
|--------------------|-----------------------|-----------------------|------------------------|------------------------|
| <i>Inno</i>        | 0.0119 ***<br>(14.51) |                       | 0.0296 ***<br>(11.37)  |                        |
| <i>Ent</i>         |                       | 0.2514 ***<br>(8.95)  |                        | 0.4217 ***<br>(6.98)   |
| <i>Target</i>      |                       |                       | -0.0815 ***<br>(-6.62) | -0.0532 ***<br>(-5.91) |
| <i>Inno×Target</i> |                       |                       | -0.0258 ***<br>(-3.97) |                        |
| <i>Ent×Target</i>  |                       |                       |                        | -0.0389 ***<br>(-4.13) |
| <i>Hum</i>         | 0.0049 ***<br>(4.74)  | 0.0037 ***<br>(3.39)  | 0.0054 ***<br>(7.58)   | 0.0042 ***<br>(3.05)   |
| <i>Gov</i>         | 0.0314<br>(0.72)      | 0.0095<br>(0.29)      | 0.0349<br>(0.65)       | 0.0108<br>(0.34)       |
| <i>Open</i>        | 0.0264<br>(1.07)      | 0.0130<br>(1.36)      | 0.0331<br>(0.94)       | 0.0149*<br>(1.85)      |
| <i>Infra</i>       | 0.0051 ***<br>(14.38) | 0.0043 ***<br>(14.86) | 0.0055 ***<br>(16.17)  | 0.0046 ***<br>(15.65)  |
| <i>Urb</i>         | 0.0418 **<br>(2.35)   | 0.0353 ***<br>(3.97)  | 0.0517 **<br>(2.16)    | 0.0407 ***<br>(3.50)   |
| <i>Fin</i>         | 0.0179 ***<br>(3.32)  | 0.0089 ***<br>(5.03)  | 0.0185 ***<br>(3.55)   | 0.0132 ***<br>(5.74)   |
| <i>Ind</i>         | 0.0955<br>(1.17)      | 0.0768<br>(0.63)      | 0.1126<br>(1.06)       | 0.0571<br>(0.58)       |
| 常数项                | 0.1459 ***<br>(17.56) | 0.1571 ***<br>(13.35) | 0.1481 ***<br>(15.16)  | 0.1604 ***<br>(12.51)  |
| AR(2)              | 0.29                  | 0.48                  | 0.25                   | 0.52                   |
| Sargan             | 0.47                  | 0.37                  | 0.51                   | 0.43                   |

注:\*\*\*、\*\*、\* 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t值,Arellano-Bond AR(2)检验和Sargan检验分别报告了检验的p值

## (二) 稳健性检验

### 1. 替换被解释变量

本文使用聂长飞等(2020)测算的高质量发展指数来衡量经济高质量发展,进而进行估计。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企业家创新精神和企业家创业精神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企业家精神可以显著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政府经济增长目标和企业家创新精神交乘项以及政府经济增长目标和企业家创业精神交乘项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负,表明政府经济增长目标对经济高质量发展与企业家精神的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过高的政府经济增长目标会抑制企业家精神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证实了本文结论的稳健性。

### 2. 加入工具变量

本文使用的系统GMM估计方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企业家精神和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反向因果关系,但是寻找合适的外生工具变量并进行估计可能更优。一个合适的外生工具变量需要满足两个条件,要与内生变量具有较强的相关性并且与随机误差项无关。因此,本文参考李宏彬等(2009)以及程锐(2019)的研究,采用滞后30年的国有企业职工数占职工总数的比率作为企业家精神的工具变量来进行估计,数据来源于《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企业家创新精神和企业家创业精神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政府经济增长目标和企业家创新精神交乘项以及政府经济增长目标和企业家创业精神交乘项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负,本文结论依然稳健。

表3 稳健性检验之一: 替换被解释变量

| 变量                          | (1)                   | (2)                    | (3)                     | (4)                     |
|-----------------------------|-----------------------|------------------------|-------------------------|-------------------------|
| <i>Inno</i>                 | 0.0744 ***<br>( 7.79) |                        | 0.1305 ***<br>( 5.14)   |                         |
| <i>Ent</i>                  |                       | 0.8420 ***<br>( 6.17)  |                         | 1.2437 ***<br>( 4.02)   |
| <i>Target</i>               |                       |                        | -0.3163 ***<br>( -4.72) | -0.1045 ***<br>( -5.35) |
| <i>Inno</i> × <i>Target</i> |                       |                        | -0.0914 ***<br>( -2.95) |                         |
| <i>Ent</i> × <i>Target</i>  |                       |                        |                         | -0.1205 ***<br>( -3.32) |
| 控制变量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 常数项                         | 0.1736 ***<br>( 9.26) | 0.2235 ***<br>( 13.97) | 0.2480 ***<br>( 8.84)   | 0.2571 ***<br>( 11.59)  |
| AR( 2)                      | 0.17                  | 0.34                   | 0.20                    | 0.41                    |
| Sargan                      | 0.55                  | 0.49                   | 0.64                    | 0.57                    |

注: \*\*\*、\*\*、\* 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t值,Arellano-Bond AR( 2) 检验和Sargan检验分别报告了检验的p值

表4 稳健性检验之二: 工具变量

| 变量                          | (1)                   | (2)                   | (3)                    | (4)                     |
|-----------------------------|-----------------------|-----------------------|------------------------|-------------------------|
| <i>Inno</i>                 | 0.1120 ***<br>( 4.37) |                       | 0.3295 ***<br>( 4.19)  |                         |
| <i>Ent</i>                  |                       | 0.4613 ***<br>( 3.15) |                        | 0.6535 ***<br>( 2.92)   |
| <i>Target</i>               |                       |                       | -0.1449 **<br>( -2.25) | -0.1173 ***<br>( -3.56) |
| <i>Inno</i> × <i>Target</i> |                       |                       | -0.1280 **<br>( -2.17) |                         |
| <i>Ent</i> × <i>Target</i>  |                       |                       |                        | -0.1845 ***<br>( -3.08) |
| 控制变量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 常数项                         | 0.1659 ***<br>( 8.38) | 0.1205 ***<br>( 7.50) | 0.1386 ***<br>( 6.36)  | 0.1422 ***<br>( 7.01)   |
| AR( 2)                      | 0.16                  | 0.31                  | 0.12                   | 0.28                    |
| Sargan                      | 0.43                  | 0.33                  | 0.47                   | 0.40                    |

注: \*\*\*、\*\*、\* 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t值,Arellano-Bond AR( 2) 检验和Sargan检验分别报告了检验的p值

## 四、研究结论与建议

本文将企业家精神划分为企业家创新精神和企业家创业精神,使用全要素生产率来测度经济高质量发展,在地方政府制定经济增长目标的背景下,实证研究了企业家精神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效果。研究发现,企业家精神显著地促进了经济高质量发展。在进一步引入了政府经济增长目标的调节作用后发现,政府经济增长目标对经济高质量发展与企业家精神的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当地方政府制定越高的经济增长目标时,企业家精神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越弱,即地方政府制定过高的经济增长目标会抑制企业家精神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对新时代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精神对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作用的建议如下:

第一,营造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的社会环境。坚持推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政策,继续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大对创新创业人才的培养力度,促进企业家精神的培育。此外,要加快完善产权保护制度,建立健全的法制体系,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保护企业家的合法权益。同时,要加大企业家创新创业专项资金投入,提升企业家创新创业服务水平,完善企业家创新创业扶持政策,建立长效的企业家精神激励机制,为企业家精神的繁荣创造有利条件。

第二,建设更好发挥企业家精神作用的制度体系。新时代下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企业家精神,要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打破要素市场壁垒,促进要素自由流动,有效破除阻碍企业家精神发挥作用的体制机制障碍,更好地发挥企业家精神在资源要素配置过程中的关键作用。此外,要充分利用企业家精神的知识溢出效应,建立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机制,提高科研成果转化率,使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同时,加快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提高政府公共服务能力,规范政商交往行为,进而减少企业家的寻租活动,将更多企业家要素配置到生产领域,使企业家精神更好地服务于经济高质量发展。

第三,地方政府制定经济增长目标,应当始终坚持因地制宜的原则。避免制定过高的经济增长目标,迫使地方政府和企业为了达到目标而采取粗放型的生产方式,抑制企业家精神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中央政府对地方政绩的考核方式应从以GDP为核心转向以生产率特别是全要素生产率为核心(蔡昉,2013),进而引导地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更加注重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同时,应当加快建立良性的政企互动机制,畅通政企沟通渠道,提高政府对企业监管的公平性、规范性、简约性,鼓励企业及时向政府反映自身运营情况,形成良性的政企互动关系。

### 参考文献:

- 蔡昉.2013.中国经济增长如何转向全要素生产率驱动型[J].中国社会科学(1):56-71,206.
- 陈昌兵.2018.新时代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动力转换研究[J].上海经济研究(5):16-24,41.
- 程锐.2016.市场化进程、企业家精神与地区经济发展差距[J].经济学家(8):19-28.
- 程锐.2019.企业家精神与区域内收入差距:效应与影响机制分析[J].经济管理(6):91-108.
- 程锐,马莉莉.2019.市场化改革、金融发展与企业家精神[J].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4):100-114.
- 贺晓宇,沈坤荣.2018.现代化经济体系、全要素生产率与高质量发展[J].上海经济研究(8):25-34.
- 金碚.2018.关于“高质量发展”的经济学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4):5-18.
- 李宏彬,李杏,姚先国,等.2009.企业家的创业与创新精神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J].经济研究(10):99-108.
- 李小平,李小小.2017.企业家精神与地区出口比较优势[J].经济管理(9):66-81.
- 李政,刘丰硕.2020.企业家精神提升城市全要素生产率了吗?[J].经济评论(1):131-145.
- 李政,杨思莹.2018.财政分权、政府创新偏好与区域创新效率[J].管理世界(12):29-42,110,193-194.
- 刘思明,张世瑾,朱惠东.2019.国家创新驱动测度及其经济高质量发展效应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4):3-23.
- 马茹,张静,王宏伟.2019.科技人才促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了吗?——基于科技人才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效应的实证检验[J].经济与管理研究(5):3-12.
- 马忠新,陶一桃.2019.企业家精神对经济增长的影响[J].经济学动态(8):86-98.
- 聂长飞,简新华.2020.中国高质量发展的测度及省际现状的分析比较[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26-47.
- 孙英杰,林春,刘融冰.2019.企业家精神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中国科技论坛(1):152-160.

- 吴延兵.2017.中国式分权下的偏向性投资[J].经济研究(6):137-152.
- 徐现祥,李书娟,王贤彬,等.2018.中国经济增长目标的选择:以高质量发展终结“崩溃论”[J].世界经济(10):3-25.
- 余泳泽,潘妍.2019.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与服务业结构升级滞后并存之谜:基于地方经济增长目标约束视角的解释[J].经济研究(3):150-165.
- 曾铖,李元旭.2017.试论企业家精神驱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基于我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上海经济研究(10):81-94.
- 张玉利,谢巍.2018.改革开放、创业与企业家精神[J].南开管理评论(5):4-9.
- 郑炫圻.2020.企业家创新精神与区域经济增长方式转变[J].经济经纬(2):9-18.
- 周黎安,刘冲,厉行,等.2015.“层层加码”与官员激励[J].世界经济文汇(1):1-15.
- 庄子银.2003.南北模仿、企业家精神和长期增长[J].经济研究(1):62-70,94.
- ACS Z J, AUDRETSCH D B, BRAUNERHJELM P, et al.2012.Growth and entrepreneurship[J].Small Business Economics,39(2):289-300.
- BAUMOL W J.1968.Entrepreneurship in economic theory[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58(2):64-71.
- BEUGELSDIJK S, NOORDERHAVEN N.2004.Entrepreneurial attitude and economic growth: A cross-section of 54 regions[J].Annals of Regional Science,38(2):199-218.
- BLUNDELL R, BOND S.1998.Initial conditions and moment restrictions in dynamic panel data models[J].Journal of Econometrics,87(1):115-143.
- BORGE L E, BRUECKNER J K, RATSSO J.2014.Partial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demand responsiveness of the local public sector: Theory and evidence from Norway[J].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80(1):153-163.
- BRAUNERHJELM P, ACS Z J, AUDRETSCH D B, et al.2010.The missing link: Knowledge diffus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in endogenous growth[J].Small Business Economics,34(2):105-125.
- DIXIT A K, STIGLITZ J E.1977.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and optimum product diversity[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67(3):297-308.
- HEBERT R F, LINK A N.1989.In search of the meaning of entrepreneurship[J].Small Business Economics,1(1):39-49.
- PANAGIOTIS L, SPYRIDON R.2015.Development paths in the knowledge economy: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in Greece[J].Journal of the Knowledge Economy,6(4):1063-1077.
- SALGADO-BANDA H.2007.Entrepreneurship and economic growth: An empirical analysis[J].Journal of Developmental Entrepreneurship,12(1):3-29.
- SCHUMPETER J A.1912.The theory of economics development[M].Cambridge,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STEPHENS H M, PARTRIDGE M D, FAGGIAN A.2013.Innovation, entrepreneurship and economic growth in lagging regions[J].J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53(5):778-812.
- ZHANG T, ZOU H F.1998.Fiscal decentralization, public spending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J].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67(2):221-240.

(编校:蜀丹)

## Entrepreneurship, Economic Growth Goal and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WANG Wenju<sup>1</sup>, YAO Yijia<sup>2</sup>

(1.School of Economics, Beijing Wuzi University, Beijing 101149, China;

2.School of Economics, 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Beijing 100070,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provincial panel data of China from 2001 to 2017,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troducing local governments to set economic growth targets, the systematic GMM method is used in this paper to empirically study the effect of entrepreneurship on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results show that entrepreneurship significantly improves the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After introducing the regulatory role of government economic growth goals, it is found that when local governments set higher economic growth goals, the weaker the role of entrepreneurship in promoting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that is, the excessively high economic growth goals set by local governments will inhibit the role of entrepreneurship in promoting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conclusion of the study provides a policy basis for inspiring and protecting entrepreneurship in the new era and improving the role of entrepreneurship in promoting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Key words:** Entrepreneurship;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Economic Growth Target; System GMM;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